

# 临沂党史資料



3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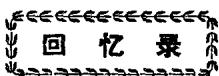
# 临沂党史资料

3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九月

# 目 录



回忆鲁南地下党斗争实况	刘谐和	(1)
忆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	王任之	(12)
板泉崖中共地下支部活动概述	薛汉鼎	(19)
关于一九三八年临沂县委的片断回忆	杨士法	(26)
我党同张里元部统一战线合作与分裂的回忆	狄井芳	(32)
临沂费峄四县边联支队第一大队的成长	郭仲选	(39)
临沂战斗生活回忆片断	张云榭	(52)



抗战时期的中共临郯县委	(60)
临沂县第十小学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70)
临费沂(沂临)边联县概述	(75)
关于沂临边联县情况的补叙	王介福(88)
册山区王家对河村土改经过及其经验	(92)

## 重大战例(一)

胭脂山伏击战	(103)
车辆据点围困战	(104)

“讨王驱李”战斗	(106)
抱犊崮山区反“扫荡”	(107)
再克青驼寺	(109)
破敌三道封锁线	(110)
东、西马山讨顽战斗	(112)
坊前战斗	(114)
临西讨王(洪九)战役	(116)
临邳边讨张(里元)战役	(119)

**人物传记**

董少白同志传略	碧野 (122)
---------	----------

**档案、文字资料选**

临沂县两月来放手发动群众的总结	张华 (127)
-----------------	----------

**△来信选登△**

王献廷同志来信	(131)
杨信同志来信	(133)
孙哲南同志来信	(136)

**插页：**

1. 一九三五年“临沂县总图”(缩印件);
2. 一九三八年中共临沂县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证书”(影印件)。

# 回忆鲁南地下党斗争实况

刘谐和

## 一、鲁南支部建立前后

刘之言，名汾，山东郯城马头镇人，高小毕业后赴济南一师学习，在校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负有党组织任务回乡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刘之言任马头三小教员。同年初，我亦受聘三小工作。其时，小教工资微薄，月薪只八到十元。之言同志以三小为基础，联络马头同乡小学教员，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其目的明是提高教师工资，实则想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吸收党员。

一九二九年秋，以三小为首，发动了一次罢课斗争，以“先生饿跑了”为名，赴县教育局请愿，要求增加工资。当时，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学董多系豪绅、地主，他们霸占庙产和学田，名利双收。所用教员，均有某些私人关系。因此，虽以小教联名义进行罢课斗争，但其他学校都未行动。反动县长害怕事情闹大，引起连锁反应，答应增薪到十五元，恢复上课，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与此同时，反动派拆分三小阴谋也产生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刘之言在三小发展了我入党。他对我说：郯城一小里有个叫孙镇国的同志，家是临沂，是我在济南读书时发展的党员，有了三个党员，我们就可以成立一

个支部了……不久，刘之言、孙镇国和我在马头三小召开了会议，正式建立“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刘之言想隐蔽自己，提出由我当支部书记的意见，经过互让后，还是刘之言同志任书记兼宣传委员，我任副书记，孙镇国同志任组织委员。在这次会上，党支部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为应付拆分三小的阴谋，减少国民党的注意力，调孙镇国到三小任教，我到郯城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并由我负责集资设一小型商店，作为来往同志的联络站；（二）派学生刘盛华（后改叫刘德生）到临沂山东省立五中学习，以便今后开展临沂城各校的学生工作；（三）研究今后发展党员的对象（如宋幼准、马叙卿等）；（四）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以传播革命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如徐敬君同志，就是当年的会员）。

支部成立后，我便到民教馆工作，馆长叫许雅稚，另外还有一个姓于的馆员。根据党支部研究的意见，我们在城南关筹办了“摩登商店”，由我曲阜二师的同学许敬石为经理，安排我的学生高同山（国民党员）在那里工作，以此迷惑国民党。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工作开展的很好。

有一次，我针对时局发表了一次讲演，中心是说国民党当局是和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动。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元老派胡汉民的话，但引起了国民党郯城县政府的反感。民众教育馆办了一个小报。一九三一年秋，我听到从徐州来的人讲，在日寇炮击上海时，国民党李济深撤兵洛阳的消息后，便以《日寇占上海，世界大战将开始，敌炮轰南京，国府专车去洛阳》为题出了一个小报号外发出来。这下子国民党便不愿意了，县党部常委李建斋气势汹汹地对我

说：你这是左倾言论，混淆听闻，扰乱了金融……。我说：“这是事实啊，反正不是我自己编造的。”李虽然当时嘴上说不出别的来，但心里对我却很嫉恨。加上我们在筹办商店基金时，杀了几棵树，办起了商店后又客观上顶了国民党商店的生意，一九三二年正月，县党部李建斋等策划后，便以上述罪名将我驱逐出郯城县境。

我离开郯城，到临沂投奔教育界熟人刘子寿（刘可大）。他得知我出事消息后，告诉我说：我有个朋友叫尚景修，此人是满清庠生，很有学识，现正在费县筹办师范讲习所并任所长，由于一时找不到人，托我帮助寻找合适的教书先生，这样，你去不是很好吗？……我急忙把此事告诉了刘之言、孙镇国同志。他们认为，费县方面正好没有咱们的人，去那里开辟工作，可以为今后活动扩大影响。于是，我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到了费县师讲所任教。

师讲所因刚开办，只招收一个班级，有学生三十多入，虽只有我一个人教学，倒也比较松闲。当时，由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颁布了连坐法，开展党的活动一时受到不少的影响。为了打开局面，我采取先在校外发展，尔后步步深入的方法，商景修所长有个侄子叫商心如（后改为尚明），当时在费县任教育委员，这个人思想开朗，比较进步，很有政治见解，因其叔父的关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四月间，我首先发展了尚明同志入党，接着又在学生中发展了李锡瑜（李伯瑾）、诸葛昌林入党。后来尚明又介绍了费县一小陈子未、县教育局会计划子峨等入党，并在国民党县党部介绍了陈子其入党，这个人的作用很大，能及时地把县党部的情况报告我们。

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我提出请县党部一个常委的老婆到师讲所任音乐教师，并常到县党部里去走走，以示亲近。有一次，县党部有个姓顾的委员曾跟我谈论第三党的问题；其人想插手青年学生运动，利用学生起来搞学潮等来反对头头，扩大个人势力，夺取领导权。由于毛振凤新到费县重新成立国民党宣传站，加强了反动统治，我便指示尚明等尽量打入国民党内部，作好内线工作。不久，尚明、刘子峨、陈子齐等同志都参加了国民党，以此为掩护，我们开展党的活动就非常便利了。

大约这一年五、六月间，费县学生闹起了学潮，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学生问我行不行时，我说“闹闹也好。”可能有的学生在校外说我在支持等话，弄得街谈巷议，因此，县党部推测师讲所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对我产生了怀疑。那个音乐教师对我旁敲侧击地说：南方苏区的共产党在积极活动，闹乱子，这可是与国民党在争夺青年啦……她的话实际上是对我的试探与恫吓，我开始警觉起来。我到费县后不久，刘之言、孙镇国同志曾派刘盛华给我送个信，叫我到马头议事，恰巧在这时，刘盛华同志又带着刘之言的信来到了费县。信中说：一则家中有急事，二则孙镇国近与邳县唐某结婚，你速便中归贺。我深知此乃孙镇国与邳县方面接上了组织关系，便乘机以家中有急事，一时难以回校为由辞职离开了费县。临行前，我将费县党的工作交给了尚明同志负责，叫他在适当时候成立党的支部。

我首先到了临沂，拜访了在临沂县教育局工作的刘子寿。刘子寿听我不愿再去费师任教，便介绍了新任临沂县第十小学（板泉小学）校长彭伯漳与我见面。见面后只寥寥数

语，彭提出了聘我去十小任教的要求。当时我没回马头与组织联系，表示回家以后再说。我到马头时，临郯县委已在徐海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同志决定下成立，因刘之言不在，有个同志领我到重坊去找到了唐东华，我向他汇报了费县的工作，唐东华同志同意我在临沂县坚持，于是我便于是年秋天到板泉崖小学任教。

到校后，校长彭伯漳首先向我暗示了地方旧势力的顽固，使我提高了警惕。我把高年级的语文、体育、唱歌和无人教的课都包了下来，获得了较多的接触学生的机会。在教学中，我注意观察学生的思想动向，让他们做作文、写日记，考察他们的思想情况，用多种形式进行启蒙教育。经过一段时间，我选择了几位同学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这一批学生中，王福三（王任之）家境比较贫寒，是从关东来的，思想进步快，为人也还老练，另一个是李文学（李伴农），还有夏林（夏锡龄）、薛汉鼎等。当时，鲁南党组织不断派人来和我联系，刘之言也亲自来找过我，我把几个学生的情况向刘之言等作了汇报后，他表示同意吸收他们入党。我首先发展了主任之入党，接着又发展了李文学、薛汉鼎、夏林那几个。一九三二年冬天建立了支部。

伴随着党的工作的开展，学生们与我的接触甚为频繁，学校里有些教员对我产生了怀疑，风传我是“老共”，校长彭伯漳首先由疑虑而转为警惕和害怕，一时间传闻不胫而走。刘子寿得知消息后，借视察学生之机，告诉我说，当地有个叫诸葛赞甫的人，有钱有势，是个地头蛇，他向县党部告了密，说县党部要抓我，意在吓唬校长，镇压进步学生，扩大自己的力量。真可谓一箭三雕！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之事，刘

王介介绍我到临沂西南的长新桥大户宋家去教私塾。因此，我在学校放寒假前便离开了板泉小学，临走时，我指定板泉小学支部由王任之负责。

## 二、在唐东华同志领导下工作情况

唐东华同志，又名唐棣，江苏省邳县人，曾在邳县县委领导下，打进国民党邳县县大队，以副大队长名义，组织武装参加旧州暴动。从一九三〇年起，常活动于苏鲁边的涝沟（郯城西南五十里）地区，同年十月间，先后在涝沟发展了胡维鲁、张鲁峰等同志入党，翌年成立涝沟区委。一九三二年初，唐东华在重访外围建立了掩护点，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是年五月间，唐东华见到鲁南支部的传单标语后，进行了秘密地调查。不久胡维鲁从马头党员刘兆麟的汇报中，得知刘之言的进步活动，便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唐东华同志，接着，唐东华就通过刘兆麟同志的关系会见了刘之言。唐说：山东省委离鲁南太远，不便领导，故有苏鲁边徐海特委之设，鲁南一带应归特委领导。会谈结果，我们接受了唐东华同志的领导，他承认并接受了我们过去的一切工作，嗣又委任刘之言为县委书记。唐本人则往来于马头、重坊之间，领导指挥鲁南的地下斗争。

唐东华同志来后，曾领导北哨和樊家埝两次暴动，但均遭失败，经过是这样的：北哨的朱夷吾（朱次彭）系求进步而失意于国民党的青年，是我支部宋幼准同志发展的党员，他联络了一部分农民，我与刘之言都去进行过阶级教育，我去费县时还专门去过一次。北哨距国民党统治中心较远，盗匪时常出没。他建议如能把匪首徐大鼻子拉过来，则是一部分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经研究，由我与刘之言同徐大鼻子

面谈。谈话结果；他愿作我们的朋友。唐东华同志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决定以北哨作为暴动活动中心，唐东华、刘之言、孟若梦等在朱次彭家炮楼里筹备举行暴动。

一天下午，正在讨论热烈之际，国民党临沂县党部干事刘建全突入屋中，阴阳怪气地说：准备好了吗，哪天动手？……唐、刘、孟三人对此不速之客，当即下楼急议。三人认为，此人既是朱家表亲，为何不入后堂而直趋炮楼？加上朱事先没有说明此事，显系先有勾结，企图利用刘来驱逐我们而中止暴动，这说明，朱次彭已动摇叛变。共议之后，以绝后患起见，孟若梦意见立即将刘干掉。朱父跪请以身家作保，于是，唐东华等急回三小召开临时会议，由唐东华同志宣布：朱次彭已叛变。这样暴动便中途夭折了。

唐东华总结北哨失败原因，认为系家庭牵连。接着，布置第二次暴动。确定，由孟若梦同志在四湖一带组织一个大队，孙镇国、胡维鲁于涝沟一带组织一个大队；刘之言、马叙卿（马九功）在郯城二区一带组织一个大队，届时在樊家埝集结。并决定，各队会师后，由马叙卿、孟若梦任正副指挥，刘之言任政委，趁青纱帐掩护，拉起游击，如今后行动不便，则由唐东华率领赴山区。

孙、胡二人路过三捷庄，在道旁饭馆吃饭时，适逢地主武装鸣号前来，二人行动表现警惕，引起了饭馆主人的怀疑，向地主武装作了密告，遂为地主武装追获。二人被押送涝沟区后继而转郯城，不久又解省狱。筹划的第二次暴动，刚刚开始就这样失败了。

孙、胡解济南监狱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在济南捕去孙镇国同志胞弟、团省委书记孙善帅，在三小捕去校长宋幼准，

在郯城县师讲所、马头三小捕去学生数人，连南关商店人员也被传讯。最后，唐东华在重坊亦被侦捕，与宋幼淮俱解省狱与孙氏兄弟等同案分押。唐与孙氏兄弟因有旧案，均在济南遇害；胡以外籍烟草稽征员，坚持与孙素不相识送反省院，济南解放时获释；宋幼淮坚持身为国民党县党部所委派的校长，由反省院转武汉，“七·七事变”后，亦获释放。鲁南党组织与上级党的联系虽然不正常，但仍有联系的，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成立后，即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曾派孙镇国同志赴沂水寻找前济南高中的同志；在未与唐东华同志接上关系前，孙善帅同志以假期探亲为名到三小了解过支部工作情况；一九三二年，省方派徐森同志来鲁南，要我支部派青年党团员二人（男、女各一人）赴中共苏区学习（后我支部派刘盛华和临沂一女同志前往）。

### 三、苍山暴动概况

唐东华、孙镇国等同志的被捕，使鲁南党组织受到了沉重地打击。这时，就只剩下刘之言、马叙卿和我三个人了。因敌人加紧搜捕活动，我们不得不采取分散的活动方式。我在长新桥教学；马叙卿在临沂城北乔湖、郝埠一带教学；刘之言起初在临沂城东南农村小学建立一职业掩护点，后由小岭赵叙五同志在太埠建立一永久性的掩护点。他化装为农民，改名张国栋，在群众中互称张三。

一九三三年春，刘之言约我和马叙卿在临沂七区尚岩开会。会上，总结了唐东华同志领导北哨、樊家埝两次暴动失败的原因：（一）对敌我情况估计不足，造成朱家中途的变化；（二）工作缺乏策略性（如叫学生白天刨电线杆、割电线），有些蛮干；（三）保密不严（学生出入往来如同公开机

关，造成唐本人被捕）。为了响应中央号召，牵制敌力量，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我们认为，必须再接再厉，组织第三次暴动。

这次暴动的地点选择在苍山，因为这个地方是在临沂县境内，属于郯城县管辖的插花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周围村小民穷，群众基础较好，同时，在苍山举事，还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台潍公路以南。关于暴动的策略：决定采取声东击西、以虚护实、以偏卫主的办法。划苍山为主力军事区，船流（临沂城北）为政治宣传区，沂武河区的樊家埝一带为偏师作战区。暴动的方法：先由船流准备好大量的传单标语，届时向沂水大路两侧散发，把敌人注意力引向沂水、莒县方面。关于暴动的领导问题：决定以郭云方同志为司令，刘漪园同志为指挥，刘之言同志为政委；暴动成功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由赵叙五同志任主席。为积极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苍山一带扩大党的组织，由刘之言同志负责，船流地区原有临沂五中王孝先同志，这里的组织工作再派马叙卿统一负责；我的任务是：暴动前，负责长新桥一带工作，暴动开始时，去船流进行宣传工作，并用碘酒显字法向济南一中的上级党组织通讯处发一封简报告；内部交通由老交通赵春景同志担任。暴动时间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半日（农历闰五月十八日）举行。

暴动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不料沂武河区赵家楼某同志因言行失慎，被涝沟区反动派捕去，樊家埝的凌云志同志认为行动计划已暴露，就必须先发制人，因而提前行动。他们收缴了赵家楼、滩头等地地主武装四十多支枪，接着过河到胡埠、圈子一带与徐鹏蛟、李锡麟等会师，组成临时指

挥部，进攻圈子，并将殷家场地主刘子钤所存粮食分给了农民，然后率队向苍山汇合。但由于事起仓促，凌云志同志忽然想起家中存有党的材料，于是星夜回家去取，不幸被西滩头地主葛圣山侦知，捕送郯城，后为伪县长薛明亮所害。徐腾蛟同志后亦牺牲。因武装内部不纯，又失去领导。人员均各自散去。

信到苍山后，刘之言在小岭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认为事已揭开，不能再事犹豫，必须提前进行暴动。我在长新桥得信后火速奔向船流。到临沂城北郊时，正好碰到了马叙卿，我们二人连夜赶赴船流。抵达后，一面召集王孝先等同志布置行动，一面急召尚明同志速来，要他在费县建立一个能容纳五人左右的掩护点，并给找一个联络人。尚明去后，交通员赵春景同志到达船流，通知我们赶快行动，因此，我们连夜油印了标语、传单，派人向沂水等县东北大道上散发，同时用碘酒、淀粉显字法向上级党组织的通讯处发了报告。但在等候苍山方面消息时，按规定时间到达的交通一直未来，乃由马叙卿同志前去了解。马回来后方知暴动已经失败了。因尚明派来的交通已在等候，我与马叙卿急忙转移到费县去。这次暴动，由于凌云志同志先期发难，仓促提前，又适逢展书堂部唐帮植旅换防过境镇压，因而失败。在暴动中，刘漪园同志当场战死，郭云方同志被俘，刘之言虽得机警惕逃出，但在向城被反动地主所搜获，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张苇村电复就地枪决，刘之言与郭云方同志皆壮烈牺牲。

苍山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震动很大。由于张苇村公令各地严加防范，各县、区实行连坐法，大搞清乡活动，农村地下党的掩护点一时不好建立，加上临

七县委被破坏，我们的活动转入低潮。我们在费县呆了几天后，因不好掩护，我和马叙卿同志便分了手。我历经邹、滕、峄、济宁、泰安等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辗转到了武汉四八师留守处，从此离开了鲁南。

苍山暴动到现在整整五十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先烈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使人无限的感慨与缅怀。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虽长眠地下，但气贯长虹、心昭日月！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将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激励我们在四化道路上奋勇前进。

一九八一年初稿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修改

附记：

本文根据1981年4月20日、9月15日、12月28日刘培和同志谈话记录，参考刘培和同志1980年11月撰写的同名回忆录等资料整理。成稿后，分别于1983年12月21日和84年2月14日向刘老征求了意见。

---

本文作者 刘培和同志，1901年生，郯城县马头镇人，现在北京市二轻局离休。

# 忆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

王任之

说起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板泉完小，原是临沂县第十完全小学，现为莒南县板泉公社驻地完小。我的小学阶段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度过的。一九三二年暑假以后，学校里新到了一位国语教员叫刘钝之（现名刘谐和），他给我们高一级（毕业班）教国语课并当班级主任。他当时三十二岁，看上去精明强干。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这位老师与众不同。他讲课的时候，很少按着课本讲，多是选一些带有进步性的文章给我们讲解，并且接触社会现实。他出作文题则出“被压迫下的农民”、“谈内战”、“黎明前的黑暗”、“我的小史”等题目；他教歌子则教“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进行曲”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少年先锋队歌》，歌词为：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住脚步，要高举抗日（原为“鲜红”，当时改成“抗日”）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除了课堂教学以外，刘老师还很关心同学们的课外活动。他经常和同学们攀谈，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他都喜欢听。他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让我们阅读，如《郭沫若文集》、《蒋光慈文集》、《母亲》（高尔基著）、《黑手》、《牛》等，

他用猜谜语的办法，向我们介绍我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如“慢慢走”，打一人名，意指徐向前；他经常组织学生召开讲演会，让学生自己讲故事、谈感想。星期天他还走出校门，到乡村中的学生家里去访问。刘老师的教学活动就象是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各种社会问题，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幼时，我的家境比较贫寒，父兄常受本村富户的压迫。我十岁时，随父逃难至东北，乞食数月，饱尝了旧社会的酸辛，亲眼目睹了旅居大连的同胞受日本人欺凌的情形。从那时起，我恨日本鬼子，恨地主，憎恨那个不公平的旧社会，并且常有杀富济贫之念。这样，就使我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刘老师到校后，对我比较器重。我常常主动接近他，听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刘老师也经常找我个别谈话。有一次，在一个黑暗的教室里，刘老师和我谈到苏联的情形，又谈到中国的黑暗腐化，然后问我：“你感觉怎样才能救中国？”我思索了一会说：“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刘老师说：“你说得对，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可恨国民党政府不允许这样做，许多革命的青年想实行苏联的法子而被逮捕、被惨杀。但是，革命是杀不绝的。记住，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最后，他严肃地嘱咐我：“今晚上的谈话，对任何人不要讲，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要讲。”我满口应承。

在同班同学中，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即薛汉鼎、李文学（现名李伴农）、夏锡龄（现名夏林）。我们四人情投意合，朝夕相处。晚上，我们都住宿在李文学家中。有一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刘老师给我们读报，当读到万宝山惨案日